

周恩来与建国初期中国基督教反帝爱国运动的发起^{*}

刘建平

提 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基督教界的反帝爱国运动肇始于周恩来在北京与京津沪三地宗教界人士的三次谈话。会谈中，周恩来对宗教界人士阐释了中国基督教问题的实质、中国教会应该努力的方向以及政府对宗教所取的政策。受此启发，吴耀宗等人才认识到中国基督教的问题要得根本解决，必须从教会自身着手。这便有了中国基督教革新宣言的发表和反帝爱国运动的发起。

刘建平，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讲师。

主题词：周恩来 中国基督教 反帝爱国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受“一边倒”政治外交政策的影响，基于牢固树立新政权绝对权威的目的，中共中央全力支持和引导了旨在“割断同帝国主义联系”的中国基督教界的反帝爱国运动。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分管统战工作的直接负责人，周恩来直接领导和参与了这项工作^①。有关周恩来对新中国宗教工作的思考与贡献，学术界已有些许关注^②；建国初期中国基督教的反帝爱国运动也逐渐引起学人们的注意^③。然而，对建国初期周恩来在基督教问题上的认识以及他在中国基督教反帝爱国运动发起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目前学界还少有人做过专门研究。近年来有关建国初期周恩来的诸多书信、批示、电报、谈话记录等一手材料的出版，使得这一问题的研究成为可能。因此，本文拟对该问题略加梳理，以求各方斧正。

一、周恩来对建国初期基督教问题的认识

基督教传入中国最早可上溯至 1807 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华。然而，基督教在中国的长足发展却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在坚船利炮之后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基督教开始在中国由沿海而内地，由城市而乡村。到 19 世纪末，随着环境和条件的改善，中国基督教开始进入一个相对快速的发展时期，无论是教堂数目，抑或

是信徒人数，都比以前有非常大的发展。20 世纪最初 20 年，中国基督教更是迎来传教事业的“黄金时期”，传教运动“进入了一个具有良机的新时代”^④。之后，中国基督教先后遭遇到两次大的挑战，即 1922 年至 1927 年的非基督教运动和 1937 年至 1945 年的日本侵华战争。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教会和国家一样，饱尝苦难，无数的教堂化为灰烬，众多的中、外籍教牧人员惨遭拘捕、驱逐，甚至杀害。尽管如此，教会的发展却并未消歇，教徒人数仍稳中有增^⑤。

抗战结束后，中国基督教迅速着手进行战后重建，在内地的各差会及其附属机构纷纷搬回原址恢复工作，大批外籍传教士再次来华。中国基督教的“三年奋进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至 1949 年前后，中国基督教已拥有教徒约 70 万人，神职人员 1 万余名（其中外籍约占 17%），教堂 6500 多间。在这 70 余万的教徒中，约有 70% 生活于农村，多为贫苦农民，其余生活在城市的教徒也大多为贫苦市民、工人、小贩等^⑥。

伴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使中国教会走向自立和本色化逐渐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尽管中国基督教的先贤们曾经提出过自传、自治、自养的宏伟蓝图，并为之做出了些许的努力，但新中国成立时这一理想显然没有真正实

现。因为在1949年前后,中国基督教依然完全受控于西方各差会^⑦,西方国家提供的津贴仍是绝大多数教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支柱。据有关资料统计,新中国成立时基督教在华继续活动的差会多达121个,其中以信义宗为最多,有32个,公理宗最少,有2个;若以国籍来算,在华的美国差会最多,达58个,英国差会次之,有11个,仅各差会主要负责的外籍传教士多达315人^⑧。又如基督教圣公会,在全国解放时,仍保持着与13个教区、2个传道区的紧密联系^⑨。

当然,面对新中国成立这一事实,中国基督教内部也开始出现某种变化,涌现出诸如吴耀宗、刘良模等一批进步力量,其中尤以吴耀宗最为典型。早在1945年10月,吴耀宗就已经洞察到:“今日的世界,正在一个剧烈的转变中。旧的东西,将要毁灭,新的东西,已经萌芽。”吴耀宗认为,身处这样一个变动的时代,“接受某种真理,可能就是等于站在新旧两种对垒的力量中的某一方面,就等于有所偏袒,就等于参加了一个斗争。”因为“中立是不可能的”,“中立的态度,就是‘与世浮沉’,而不是‘真理至上’。”^⑩在吴耀宗看来,资本主义内部充满了矛盾,已经不能适应我们的时代,中国基督教因其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必须在新时代进行革新。因为“时代是要进展的,如果我们的宗教是迷信的,落后的,违反人民利益的,那么,我们的一切,都将遭受历史的无情审判与清算”^⑪。正是凭借对新中国的支持与拥护,吴耀宗、刘良模、邓裕志、张雪岩、赵紫宸等人被选为宗教界的代表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⑫。

政协会议后,吴耀宗对这部分教会“进步力量”的特点做过深入剖析。吴氏强调:“他们主张民主;他们反日、反蒋、反美帝国主义;他们接受新民主主义,接受共产党在政治上的领导,主张与共产党合作;他们不满于基督教的保守、腐败和它与帝国主义、封建力量的联系;他们认为社会革命是耶稣的福音的一个重要的成分,而这个成分,同共产主义的主张,是大致相同的”^⑬。

针对建国初期中国基督教的上述状况,周恩来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认识与主张,为新中

国妥善处理基督教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 阐明中国基督教问题的实质,力主中国教会割断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系。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基督教能够在华取得长足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的庇护。正因为这样,基督教在华传播过程中才会教案不断,中国人民也才会将其称之为“洋教”。到新中国成立时,基督教在中国的“洋教”形象并未发生根本改观。

对中国基督教问题的这一实质,周恩来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在不同场合的报告或讲话中有过多次的阐释。1950年6月16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的宗教问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往往利用天主教基督教等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利用宗教来挑拨中国内部的团结”^⑭。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民对基督教曾产生一个很坏的印象,把基督教叫做‘洋教’,认为基督教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分不开的”^⑮。周恩来的这一认识,显然切中了中国基督教问题的关键所在。

基于这样的认识,周恩来主张中国教会必须彻底割断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系。1950年4月13日,他在全国统战会议上的第二次报告中谈到:现在对宗教应强调与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上断绝关系,像中国天主教还受梵蒂冈指挥就不行,我们主张中国教应由中国人办,“外人要在中国传教、办教怎么办?我们也要解决,我们主张中国教应由中国人办”^⑯。此后,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基督教会要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基督教会,就必须“把民族反帝的决心坚持下去,割断同帝国主义的联系”,肃清自身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与力量,依照“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的精神,恢复宗教团体的本来面目,使自己健全起来。针对教会人士的忧虑,周恩来强调在宗教界肃清帝国主义影响的前提下,“唯物论者同唯心论者,在政治上可以合作,可以共存”,政府绝不是要消灭宗教,只是要把“宗教界的害群之马、极少数走狗、犹太,清除出去”^⑰。中国教会只有做到这些,才能彻底“堵塞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⑱。

2. 坚持宗教信仰自由,反对搞反宗教运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基督教界的许多领袖、信徒都非常忧虑宗教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担心中国共产党会实行消灭宗教的政策。针对广大教徒们的担心,更是基于中国宗教问题的长期性与群众性,周恩来坚决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反对搞反宗教运动。1950年4月,周恩来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强调:我们对宗教的态度,就是宗教自由,今天的中国“只谈反帝,不要牵连反宗教问题”,而且也“无需做反宗教运动”。原因何在呢?他认为,一方面,相比较意大利、法国“若干共产党员还到教堂中做礼拜”的情形,“中国宗教问题不像欧洲那么严重”,也远不如苏联十月革命后宗教的危害那么大,中国“只有西藏是政教不分,比较麻烦,使它政教分离仍须一个较长的时期”;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基督教的国际性,“若反对宗教”,不但引起中国教徒们的不满,还可能会“引一些欧美人民的不满”,反而不利于新中国的宗教管理工作。周恩来甚至还大胆地提出允许基督教徒入党的观点^⑬。

6月25日,周恩来进一步指出:在我国,宗教有两类,一类是民族宗教,如回教、喇嘛教,它们与民族问题连在一起;另一类是与政治有联系的基督教、天主教,对于后者的处理,要坚持宗教信仰自由原则,对反革命分子的惩治“不要牵扯到宗教”,“列宁在一九〇九年曾说过宗教就是鸦片,不要以为革命时期提出的口号胜利后就应更厉害,其实恰相反,革命时期是要把原则讲清楚,现在有了政权,有些时候倒不必要去强调‘宗教就是鸦片’了”,而要尊重民众的宗教信仰,要实行信仰自由的政策^⑭。

3. 充分肯定中国基督教界进步分子的积极作用。

尽管中国基督教在近代与各帝国主义的侵华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周恩来并没有对其全盘否定,而是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态度。他结合中国基督教的历史与实际,认为不仅基督教教义中有一定的积极因素,而且基督教界的一些进步人士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确做出了贡献。在与吴耀宗、刘良模等人的谈话中,他就明确指出,自五四运动以来,基督教里面有进步分子,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们是同情中国革命的。譬

如,基督教青年会中的进步民主人士在大革命时期就曾掩护过一些从事职工运动的革命分子和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时期,基督教青年会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在解放战争时期,也有很多基督教进步人士同情并参加了反蒋、反美斗争,反对独裁,反对内战,因而受到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迫害。正因为如此,在北京召开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宗教界的进步民主人士也有代表出席。整个中国教会也因此而倍受鼓舞^⑮。

二、周恩来与京津沪宗教界人士的三次谈话

中国基督教反帝爱国运动的发起,肇始于周恩来在北京与京津沪三地宗教界人士的三次谈话。会谈中,周恩来对在座的宗教界人士详尽地阐释了中国基督教问题的实质、中国教会应该努力的方向以及政府对基督教所取的态度、政策。通过这几次谈话,吴耀宗、刘良模等教会内的进步力量对中国基督教问题的实质有了真正的理解,更明确了教会在新中国应努力的方向。

1949年10月25日至26日,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在上海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执行委员会,吴耀宗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向与会的执委们报告,新政府将在内务部之下设立“宗教事务委员会”,政协也将设“宗教事务组”。鉴于此,协进会的执委们认为在基督教方面应成立一个“全国强而有力之行政总机构,以谋与人民政府宗教机构取得联系”。故执委会决定由全国协进会在最短时间内召开包括全国各大小宗派的基督教代表会议,以商讨成立一个行政总机构^⑯。为促进全国基督教代表会议的召开,执委会决定组建基督教访问团,前往华北、华中、西北、华东及华南进行访问,以勘查各地教会的状况^⑰。

很快,访问团对华东、华中、西北、华北等多个城市的教会进行了走访。期间,代表们先后发现很多地方发生了征用教堂、没收《圣经》等干涉宗教信仰的事件。仅华北五省,代表们就“汇集了一百六十多件关于基督教的案件,送给有关当局处理”。“还有许多个别的案件”,代表们“都送请地方或中央的当局处理”。^⑱正是各地教会遇到的困难迫使吴耀宗等人在结束对济南的访问后,决定转赴北京,请求人民政府帮助。这便有了周恩来与京、津、沪宗教界人士的座谈

会。

1950年5月2日下午,周恩来在政务院接见了吴耀宗、刘良模、邓裕志、崔宪祥、王梓仲、涂羽卿及江长川^⑥等七人,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副部长陈其瓌在座。吴耀宗首先向周恩来报告了基督教的一般情况及在新政权下遇到的各种困难,并恳请政府帮助解决这些问题^⑦。对于吴氏所言的教会各种困难,周恩来直言: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关键在于近百年来基督教传入中国和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联系着的”,基督教是靠着帝国主义枪炮的威力强迫中国清朝政府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获得传教和其他特权的。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民对基督教曾产生一个很坏的印象,把基督教叫做‘洋教’”,才会“认为基督教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分不开的,因而也就反对基督教”。因此,他要求宗教与政治必须分开,中国宗教团体应该“把民族反帝的决心坚持下去,割断同帝国主义的联系,让宗教还它个宗教的本来面目”。谈话间,周恩来并没有讳言宗教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区别,但声明政府并“不搞反宗教运动”,“只要求宗教团体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以“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⑧。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在这次谈话中提到了“三自”(即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谈话后不久,吴耀宗说:“当我们把基督教二十几年来所提倡的自治、自养、自传的理想告诉周总理的时候,他不但表示赞同,也表示嘉许,认为这是基督教今后必须遵循的途径。”^⑨又据参加谈话的刘良模回忆,当周“静听我们各人提出来的教会的困难和要求”后,“坦率地对我们说中国基督教的困难是因为它过去曾经被帝国主义利用,所以基督教和人民群众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中国基督教为什么不能也站起来,办自己的教会呢?”在座的崔宪祥就说:“对啊!好久以前,我们基督教中间曾经主张由我们中国基督徒办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周听后充分肯定了崔提出的“自治、自养、自传”原则,认为这一原则可以消除“中国人民与基督教之间的鸿沟”^⑩。

第一次谈话结束后,吴耀宗立即会同其他人

商讨再次与周恩来会谈时将要提出的具体意见,并撰写了递交给周的《关于处理基督教问题的初步意见》的报告书。这份意见书包括的内容有:关于肃清帝国主义力量提高民族自觉精神的办法、关于基督教团体之登记、关于占用教会房产之处理办法、关于宗教信仰自由之各种规定以及关于设立中央宗教机构问题等。这份递交给周的文件中虽有“关于肃清帝国主义力量提高民族自觉精神的办法”一条,但吴氏明确指出它并不是文件的主要内容,而“其他的几项才是文件的中心”。^⑪

应周恩来之邀,吴耀宗等人于5月6日第二次赴政务院进行座谈。周恩来在谈话中进一步强调:“基督教最大的问题,是它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中国基督教会要成为中国自己的基督教会,必须肃清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与力量,依照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的精神,提高民族自觉,恢复宗教团体的本来面目。”周还明确指出,虽然“中国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现在的中国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非基督教国家,因此“传教是要受到若干限制的。在土改新区,在乡村,最好慢一点。东北是我国的一个新国防区,在教会同帝国主义的关系没有搞清楚的时候,在基督教还没有成为完全是中国的教会时候,不要去增加复杂性”。至于外国传教士和捐款问题,周指出:“我们不再请外国传教士到中国来”,“已经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政府“并不马上要他们走,他们可以等到双方合同期满再走”;基督教既然清算同帝国主义的关系,经济方面“就不应该再向外国募捐”^⑫。周的指示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诸位宗教界人士和中国基督教的期望。

第二次谈话后,吴耀宗与同道们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对《关于处理基督教问题的初步意见》进行修改,于11日易名为《中国基督教今后努力的途径》,并呈送给周^⑬。5月13日晚,周恩来第三次约见吴耀宗等19人。在第三次谈话中,周恩来再次指出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团体的事实,并强调在宗教界肃清帝国主义影响的前提下,“唯物论者同唯心论者,在政治上可以合作,可以共存”。针对教会人士的忧虑,周重申政府不是要消灭宗教,只是要把“宗教界的害群之

马、极少数走狗、犹太，清除出去”。谈话间，周清楚地揭示了政府对宗教界的政策要求。这就是，宗教界必须“去腐创新”，肃清帝国主义影响，割断帝国主义关系，在政治上与政府合作，只有在政治上“站稳脚跟，便毫不会受到歧视，只有这样才是出路”^③。这次会谈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三点半才结束。

周恩来的谈话对京、津、沪基督教界人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吴耀宗随后有过这样的记述，他说：当时“我们拜访周总理的目的，主要的是给他报告解放后基督教一般的情况，并请他帮助我们解决目前基督教所遭遇的困难”，“但周总理谈话的中心，却在指出基督教同帝国主义在历史上的联系，和帝国主义在目前国际中利用基督教去进行反革命工作的事实与可能”。“周总理所做的清楚的分析，却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和鲜明的启示。这个启示是什么呢？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这个启示就是：基督教应当自动地肃清帝国主义在它里面的力量 and 影响。一个没有参加谈话的读者，是不容易了解这句话的涵义的。”^④

三、中国基督教反帝爱国运动的发起

受周恩来的启发，吴耀宗等人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基督教的问题必须从教会自身着手，才能得到根本解决，而非当初所想的请求政府下令保护教堂那么简单。正因为这样，在京期间，吴耀宗等人即着手起草向全国教会同道发出呼吁的重要文件《中国基督教今后努力的途径》，积极酝酿中国基督教反帝爱国运动的发起。

在这份日后称之为“革新宣言”的重要文件的形成过程中，周恩来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多次加以指导。在1950年5月20日的中共中央、政务院有关单位负责人座谈会上讨论吴耀宗所起草的文件时，周恩来指出：“吴耀宗所拟定的第五次修正的宣言，比过去多了一个序言，把基督教同帝国主义的关系说得很偶然，就让他那样吧。一个字不改，照样发表。宣言里说的话和我们说的话不一样，我们也不需要宣言和我们说的一样。这样便于团结群众。”周恩来还明确告诫在座的各位负责人：“对基督教，一方面不能无原则地团结，另一方面不要脱离广大群众。这是政策问题”，而且要求大家务必达成一致认识，认

清“基督教客观上被帝国主义利用”的事实，“要团结多数，争取中间分子，打击极少数反动分子”，只有这样，才能“具体地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分清是非，解决问题，共同前进”^⑤。

6月1日，周恩来就宣言的起草问题专门致电吴耀宗，以示肯定与勉励。他认为基督教内人士起草的《中国基督教今后努力的途径》“基本方针是好的。它打开了中国基督教会及其团体今后在《共同纲领》基础上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的新的努力途径”，希望吴耀宗等人能够以此精神“劝导中国基督教代表人物响应这一主张，以利基督教会的革新”。在文件的具体内容方面，周恩来也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建议。他认为：文件前的“说明可以不要”；文件中凡“基督教”字样应改为“中国基督教教会”更为恰当、准确；“具体办法中一、二两项以不要后半句‘其实行办法应与政府协商规定之’为好，否则，可改为‘其实行办法另商定之’；最后一项‘教堂被占用’以改为‘教堂被借用或征用’为更易处理”^⑥。除此之外，周恩来也不忘在党内继续做工作。1950年6月7日，周恩来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外交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在谈到宗教关系时，他希望各级干部要帮助宗教界人士割断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赞助他们“自己办宗教，自演自唱，不要外国人来传教”^⑦。

吴耀宗返回上海后，中国基督教访问团的活动便宣告结束，他们没有再按原计划对东北和华南地区进行访问。因为在周恩来的影响下，吴耀宗等人对问题的关注点发生了些许的变化，收集各地教会面临的困难及问题已经让位于如何割断中国基督教与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受周恩来的启发，吴耀宗等人认为，倘若中国基督教进行彻底的革新，划清与西方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界限，去腐创新，由原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变为中国人民自己的宗教事业，各地教会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便会随之消失。1950年7月28日，在广泛联络全国各地教会的基础上，吴耀宗与各教派40余人联名发出了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三自”革新宣言，号召全国基督教徒割断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警惕帝国主义利用宗教的反动阴谋，并培养爱国与民主精神，实行

自治、自养、自传^⑧。

吴耀宗等中国基督教界的进步力量树起反帝爱国的旗帜后，周恩来依然保持着对基督教问题的关注与支持。至8月25日，签名于革新宣言上的基督教人士已有“六百零一人”，到9月底更“可能达到二千人”，这些签名“从地域和签名者身份说，都很有代表性”。有鉴于此，吴耀宗特意“请示周总理，该宣言第一批签名可否在八月底结束，并先发表第一批”，并“希望八月底前得周总理回电指示”。周恩来获悉后，立即于8月29日就基督教人士宣言签名活动事给华东局统战部去电，表示“同意吴耀宗所发起的基督教人士宣言第一批签名即在八月底截止”，并予以公开发表^⑨。

为进一步表明中共中央的态度并扩大吴耀宗等人发表宣言的影响，周恩来于9月15日就发表基督教革新宣言事，致电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夏衍并转告吴耀宗，称：“此项文件（笔者注：指革新宣言），拟予全部发表，并由《人民日报》为文赞助，以广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周恩来在电文中不但充分肯定了吴耀宗“为发表宣言，推动各方”所做出的努力，还从“减少各教会团体、学校、医院对于立即断绝国外接济的顾虑”的角度考虑，建议将“宣言中具体办法第一项内‘立即’两字”取消^⑩。因为在周恩来看，解决中国基督教与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来就是要“有步骤地进行”，所以，去掉“立即”两字不但与宣言的主旨并无违背之处，还可减少反帝爱国运动的阻力。

这一合理且富有策略性的建议立即被吴耀宗等人采纳。2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刊载了吴耀宗等人按周恩来意见修改后的《三自宣言》，公布了截止8月底首批在宣言上签名的1527位基督教徒的名单，并以《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为题发表了态度鲜明的社论。社论指出：“欢迎基督教人士所发起的自治、自养、自传运动”，“这是基督教人士应有的使中国基督教脱离帝国主义影响而走上宗教正轨的爱国运动”，“一切宗教的信徒们都可以由此得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只有朝这个方向走，宗教界才可能建立自己的正常的宗教事业”^⑪。此后，一场声势浩大、

旨在割断与帝国主义联系的中国基督教界的“民族自觉运动”开始在全国各地渐次展开。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短短几年间，发轫于1950年5月周恩来与宗教界人士谈话的中国基督教的反帝爱国运动便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截止1953年12月，全国各地签名于革新宣言上的基督教徒便达40万人，约占当时全国基督教徒的2/3。更为重要的是，几年来中国基督教的反帝爱国运动已经“把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在中国进行文化、政治侵略的阵地基本上打垮了，中国基督教正在改变着自己的面貌，正在变为中国教徒自己管理的宗教事业”^⑫。

（责任编辑：若火）

* 本文是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基督教政策及其历史经验研究”（项目号10CDJ005）的阶段性成果。

-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741页。
- ② 参见王晓明、姬芬芳：《周恩来对新中国宗教工作的重要贡献》，《中国宗教》2009年第3期；陈德才：《周恩来对新中国宗教工作的思考与实践》，《中国宗教》2006年第1期；郭林：《论周恩来的宗教工作思想》，《人文杂志》1998年第6期；王肖燕：《对周恩来宗教观的几点认识》，《中国宗教》1998年第2期；等等。
- ③ 参见陈金龙：《试论建国初期的宗教革新运动》，《人文杂志》2002年第5期；赵晓阳：《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基督教革新运动的初始》，《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3期。
- ④ [美] 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84—187页。
- ⑤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7页。
- ⑥ 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08—409页；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33页。
- ⑦ 《中国基督教团体调查录》，1950年，上海市档案馆藏，U123/0/187，第110—123页。
- ⑧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数据组编印：《中国基督教概况》，湖北省档案馆藏，SZ/D/197，第1—2页。
- ⑨ 政务院宗教事务处数据组编印：《中国基督教主要公会情况》，1954年5月，河北省档案馆藏，938/3/118，第1—2页。
- ⑩ 吴耀宗：《真理至上》，《天风》第20期，1945年10月22日。

- ⑪ 吴耀宗：《基督教时代的悲剧》，《天风》第 116 期，1948 年 4 月 10 日。
- ⑫ 1949 年 9 月 21 日至 30 日，中共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宗教界代表共 8 人应邀参加会议，其中基督教代表占到 5 名之多。他们分别是吴耀宗、赵紫宸、刘良模、邓裕志、张雪岩。关于宗教界代表的选择问题，周恩来有过清楚的解释。他说：“允许宗教信仰自由是一件事，邀请宗教界民主人士参加政协或各界代表会是另一件事，后者是以政治为标准的。”见《周恩来在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作用的几个问题》，1950 年 4 月 13 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 册，第 185—186 页。
- 作为宗教界的代表之一，吴耀宗对此也非常清楚。他在会议期间就公开指出：我们的宗教过去曾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束缚和利用，现在中国人民解放了我们，宗教应当大大的革新，必须清除基督教内部腐恶陈败的毒素，从思想中摆脱欧美资本主义的影响，并号召全体基督教徒加强学习新民主主义、毛主席言论、政协会议文献，进行自我教育，以努力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伟业。参见《人民日报》，1949 年 9 月 29 日，第 6 版。
- ⑬ 吴耀宗：《我们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的经过》，《田家》第 16 卷第 8 期，1949 年 11 月。
- ⑭ 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2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 503 页。
- ⑮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80—187 页。
- ⑯ 《周恩来在统战会议第二次报告》，1950 年 4 月 13 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8/1，第 13 页。
- ⑰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 册，第 224 页—226 页。
- ⑱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2 册，第 503 页。
- ⑲ 《周恩来在统战会议第二次报告》，1950 年 4 月 13 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8/1，第 13 页。
- ⑳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49—50 页。
- ㉑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 册，第 221 页。
- ㉒ 《教会应改组全国机构实证耶稣福音》，《协进月刊》第 8 卷第 3 期，1949 年 11 月。
- ㉓ 《协进会执委会重要决议》，《天风》第 186 期，

1949 年 10 月 29 日。

- ㉔ 罗冠宗主编：《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1950—1992）》，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93 年，第 9 页。
- ㉕ 江长川，时任华北基督教联合会主席。
- ㉖ 沈德溶：《吴耀宗小传》，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89 年，第 53—54 页。
- ㉗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 册，第 220 页—222 页。
- ㉘ 吴耀宗：《展开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旗帜》，《天风》第 233—234 期，1950 年 9 月 30 日。
- ㉙ 刘良模：《统一战线与中国基督教》，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编：《统战工作史料选辑》第 4 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39 页。
- ㉚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1950—1992）》，第 17 页。
- ㉛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 册，第 222—223 页。
- ㉜ 《吴耀宗小传》，第 55 页。
- ㉝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 册，第 224 页—226 页。
- ㉞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1950—1992）》，第 10—11 页。另外吴耀宗在日记中也有同样的论述：“周总理态度非常公允，双方兼顾，令人佩服。我们在和周总理谈话中得到一个启发，这个启发就是，基督教应当自动地肃清帝国主义在它里面的力量和影响。”见沈德溶：《一位坚贞爱国的宗教界领袖——吴耀宗》，《统战工作史料选辑》第 4 辑，第 50 页。
- ㉟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 册，第 227 页。
- ㊱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2 册，第 454 页。
- ㊲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第 46—47 页。
- ㊳ 朱企泰等编：《统一战线大事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年，第 237—238 页。
- ㊴ 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3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 229 页。
- ㊵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3 册，第 296 页。
- ㊶ 《人民日报》，1950 年 9 月 23 日。
- ㊷ 《三年来全国基督教工作基本总结和今后工作的方针任务的意见》，1953 年 12 月 4 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3/305，第 6 页。